

国民革命时期的宋庆龄与妇女运动

叶维维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摘要: 宋庆龄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更是国共两党开展妇女运动的融合者。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参政,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卓越的政治能力,为妇女运动的推进作出了贡献。正是因为有宋庆龄这样的杰出女性,才使得近代以来中国的女权运动主要由男性精英指导与推动的局限得以突破。她以女性领袖的身份激励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实现妇女参政议政,将中国的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的潮流融合,打破了原来孤立而有限的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

关键词: 宋庆龄; 女权运动; 国民革命; 妇女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6)05-0071-05

19世纪末以来,受西方影响,女权运动在中国兴起,传统女性开始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并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随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妇女参政权成为男女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重要体现,这是因为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必须进入正式的政治机构中,这是打破男性社会支配地位的重要策略之一”^[1],而妇女参政也是争取“男女平权”的必要手段“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予女子以参政权不可”^[2]。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以忠诚的孙夫人形象,坚决捍卫孙中山思想,逐步走上政治舞台。在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她一度当选为国民党政治决策的核心成员之一,成为国民党内第一位进入政治权力高层的女性。她在国民党决策中枢发挥作用的参政经历极大地配合了当时日益高涨的妇女运动,鼓舞了一批青年女性参与政治、投身革命的热情,无疑是“中国妇女的最高典范”^{[3][P12]}。

一、进入国民党决策高层,推进女子参政权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永久纪念会”,宋庆龄为纪念会永久委员^[4]。这一身份虽为名誉性质,但赋予宋庆龄“随时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权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未召开时“执行本党之通常或非常党务”^{[5][P24]},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人事党务之职责,是保证党内有序有效运转的重要部门。宋庆龄能够随时出席这些委员会会议,不仅是对她在孙中山晚年革命事业中所发挥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她开始踏上政治舞台,进而推动妇女参政的重要途径。

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宋庆龄被正式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等36名国民党元老及党内著名人士同席。据当时统计有效票数249张,宋庆龄

收稿日期: 2016-06-20

作者简介: 叶维维(1988—),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研究。

就获得选票 245 张,得票数排在她前面的仅有汪精卫、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谭平山^{[5] [P209]}。当时参会女代表的选举权还是在“何香凝先生力争,女代表有了选举权”^{[3] [P11]}的情况下获得的,宋庆龄就已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足见她特殊的身份与政治地位。这样的身份与地位使她能够在会议上发挥促进妇女运动的作用。她与何香凝、邓颖超一起当选“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5] [P202]},将国民党第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提交大会通过。该决议的第一条就要求国民党应“特别注意妇女运动”^{[9] [P13]}。经过这次代表大会,宋庆龄“通过国民党党内的组织程序被进一步确定其政治地位”^[6]。

国民党“二大”刚刚结束,宋庆龄便在出席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强调女代表人数在妇女争取参政权过程中的重要性。她感慨近年来妇女参政人数的变化“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女代表只有三位,而且是先总理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7]。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之时,女革命家如林宗素、秋瑾等希望通过参加革命来表明她们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被拒之于议会门外,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到国民革命时期“女权运动”再掀妇女参政高潮时,女性代表在政治机构中的人数已愈渐增多,国民党“二大”规定“各省市要有女代表”^{[3] [P10]},政府党派还要竭力“促进各种妇女团体的组织和发展”^{[5] [P138]}。这样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为代表的杰出女性的努力,她们将个人的参政经历化为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妇女为争取妇女参政权而奋斗。

1926 年底,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宋庆龄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人员,与孙科、徐谦、蒋作宾、吴玉章、邓演达、宋子文等^[8]国民党要人共同处理政府事务。至此,宋庆龄已经进入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每日到“临时联席会议”所在的汉口南洋大楼办公。在汉口办公期间,宋庆龄出席各界妇女团体活动,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发表有关“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的言论,极大地推动了妇女参与政治的热情。当时在汉口,妇女们

举行“女界同乐大会”^[9],召集“女党员大会”^[10],开办“妇女平民夜校,救济失学妇女,灌输普通常识”^[11]等等,女权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宋庆龄之所以能够进入国民党决策高层,并利用特殊的身份与政治地位鼓舞妇女参政,主要是因为:其一,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忠实继承者,赢得了国民党左派人士与共产党的一致支持。其二,宋庆龄不仅参与政治,还决心凭借其特殊身份施展政治影响。陈友仁告诉她“你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人……你占据着一个明确的、历史性的地位,这就需要你留在国民党的首府。”^[12]其三,宋庆龄在与孙中山 10 年的婚姻中,作为“忠实的学生”^[13]所积累的政治素养,正是保证她能够参与政治,并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有力地反驳了民国初年“女子无政治的知识,使她参政岂不愈为纷扰”^[14]等反对妇女参政的声音。对此,宋庆龄非常认同孙中山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15],以此作为推动妇女参政的基础。1926 年底,宋庆龄与其他国民党人士到达武汉后,便开始着手妇女政治训练班的开办与招生工作。

二、创办妇女政治训练班

开办妇女党务训练班,既是国民党“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的“为扩大革命势力起见,应趁此时期,向妇女群众中去从事组织与训练”^{[5] [P137]}的奋斗目标之一,又符合当时妇女参政议政的迫切需要。宋庆龄刚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便有妇女团体组织约见,“言谈间均以如何能协助国民党促成国民革命及发展女权等问题相问。由此可推知彼等对于女子政治上有自由发展之要求,而且求进之心,亦极为热烈”^[16]。但由于时代因素,部分妇女思想觉悟不高,革命参与度不够,也成为实现这一妇女权利的阻碍。当时北伐呼声高涨,军队由广东打进两湖地区,“而妇女之行参加者并不甚多”,宋庆龄认为“这自然是大多数妇女总未觉悟的原故”^[17]。再说,就算有“求进之心”,而“彼等无相当之训练与智识,此时虽心有余而力不足也”^[16]。所以宋庆龄决心“设法办理一妇女政治学校,灌输以相当之知识”^[16],“使了解革

命意义及世界趋势 培养革命实用妇女人才, 备充各机关及党部工作职员之用”^[18]。妇女政治训练班的创办实际是推动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投身革命的后备基地。

妇女政治训练班由宋庆龄发起、招募、管理。她亲自担任主任, 兼任会计, 偶尔也为学生讲课。该训练班专门针对妇女开展党务及政治知识的训练, 因而在学员的招募上有一定限制。从规模上说, 由于初办第一期, “只能收容两湖附近之青年女子”^[16] 招生名额“暂定一百名”^[18], 实际录取者“九十四名, 外有备取九名”^[19]; 从学历上说, 要求“中学毕业, 或有相当程度者”^[18], 不过最后录取的学员“大多受过相当教育, 曾是在教育界及党政机关服务者”^[17]。有限的招生人数与一定限制的学历条件确保了妇女党务训练班具备较高的培训质量与效果。

党务训练班的课程涉及党史、法律、政治、社会等学科相关内容, 既有理论培训, 也有实践学习。通过党务训练班“养成党务妇女人才, 以从事于官职与领导而作妇女革命的前锋”, 其学员大多具有“革命的决心, 将来出而实际工作, 必能努力革命”^[17]。她们在“三八节, 总理纪念, 三二八纪念曾分发传单, 各处演讲, 编队游行, 更自动的组织学生会, 常常开会演讲, 以资练习”^[17], 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一时“咸为湖北空前未有之盛况”^[20]。

从宋庆龄独登政治舞台, 凭借特殊身份与地位发挥政治影响时开始, 她在女权运动中已经不仅仅是践行者, 而且还是积极的推动者。严格意义上说, 宋庆龄并不像何香凝、向警予、邓颖超等女革命家那样领导女权运动, 而更多的是以参与政治的方式, 在舆论、法律、教育等层面上, 推动妇女运动全面而快速地发展。如果说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是希望通过“提倡教育, 使女界知识普及, 力量乃宏, 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15]的方式来促进妇女获得权利的话, 那么宋庆龄在国民革命时期则是希望通过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促使妇女掌握“党务政治一切实用知识, 以求本身的利益, 民族的利益”^[21], 以及妇女政治人才的养成, 使“中国女子有尽义务之能力, 俾将来共享其应得之权利”^[16]。

三、融合“女权”与妇女解放

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 妇女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宋庆龄已成为“女界明星”^[22], 其“教育, 才能, 仁慈之心与国外之社会科学训练皆足使伊在今日中国之妇女中独辟一个新纪元”^[23]。她所享有的平等、自主与独立的女性地位不仅仅使她成为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典范, 更促成她发挥中间桥梁作用, 沟通国共两党所开展的妇女运动。

在共产党看来, “女权运动”是“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运动……她们大概以女子参政号召, 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24] [P117]}, 参与者多是“小姐太太, 或女政客们”^[25]。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者袁溥之曾回忆 1920 年代初期的武汉, 当时“一些著名女界人士发起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 我们请示董必武同志应不应该赞成她们, 董老说, 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 她们当中不少人是追求进步的, 我们可以赞成。”^{[3] [P10]}

在国民党看来, 1926 年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后, 女权运动所争取的男女平等与妇女参政权利已经在法律上实现。(国民党)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 助进女权之发展”^[7], “中国妇女无须争权选举, 兹按孙中山所草之国宪, 已明予妇女以选举权”^{[26] [P41]}, 在法理上妇女的平等地位与参政权已得到保证。由此看来, 女权运动与中共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是, 随着国民革命情绪的日渐高涨,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代背景之下, 任何形式的妇女运动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发展, 争取女性权利必然就面临着要与国家、民族大义相结合的命运, 这就为宋庆龄融合“女权”与“妇女解放”提供了有利契机。

在宋庆龄看来, 她首先主张争取女权运动不仅仅限于“女子参政”内容, 而强调“妇女是国民一分子”, 争取女权要与国民革命相结合。她认为“目下之新中国女子教育, 则不仅使其作贤母良妻, 且须使之成为优秀国民”^[27]。在承认妇女是国民的基础上, 她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 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 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28] [P39]}这一主

张通过她在汉口创办妇女党务训练班得以实践。妇女党务训练班使“中国女子能对于革命有相当之认识,并明晰现代世界之潮流,根据所得之智识,养成奋斗精神,造成施行国民革命者,有在政治上活动之能力。”^[16]

宋庆龄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结合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除强调“男女平等”之外,也顺应国民革命的发展潮流,积极号召妇女团体或组织投身革命。从1923年中共“三大”开始,妇女运动口号专门加入了“‘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29]。到1925年中共“四大”,培养革命化的妇女成为中共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已渐渐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革命化。”^{[24] [P118]}这些妇女运动决议都说明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之下,妇女运动必将与革命相结合。

其次,宋庆龄所主张的女权运动不仅仅限于“上层妇女”,还扩展到各阶级妇女群体。她关心女工,突破阶级限制,呼吁“吾国之奴隶妇女均须通力合作,以谋解放,工人妇女如有受压迫者,亦须设法取得自由”^[27]，“妇女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对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28] [P40]}。在国民党“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就要求“注意农工妇女教育”“赞助劳工妇女的组织”^{[5] [P138-139]}。这些主张与规定兼顾中共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所代表的最广大利益——工农妇女群体,不再局限于“上层”“贵族”妇女,而是“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妇女成为一个革命的大同盟”^[31]。

再次,宋庆龄强调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把中国的妇女运动融入世界的妇女解放。她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30] [P22]}，“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30] [P23]}，“新中国妇女之职责,应使其姊妹均有世界眼光”^{[26] [P42]}，

“吾人必须解救为奴之妇女,使其脱离压迫,吾人对于世界被压迫之民族,进行解放”^[27]等等。这种主张扩展了妇女运动的外延,使其不再局限于某一社会阶级、妇女团体或者本国内部群体,而是将中国的妇女运动纳入世界范围。

通过将女权运动与国民革命相结合、超越阶级划分联合全体妇女、纳入世界妇女解放的发展道路,宋庆龄将“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她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国民党虽有明文规定却无多大实效的“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法规逐渐产生效力,还打破了中国共产党认为的必须消灭阶级才能实现“妇女解放”的阶级局限,将全体妇女不论贫富都纳入到妇女运动范围中来。这样,她就在国共两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突破了他们各自在当时情况下的局限,使中国的妇女运动伴随着国民革命开展,向着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英]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45.
- [2]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59.
- [3] 袁溥之.大革命时我在武汉的经历[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C].1983.
- [4] 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59.
- [5]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 [6] 周大计.从幕后走到台前——孙中山逝世前后的宋庆龄[J].人物,2008(11):59.
- [7] 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1926年1月20日)[A].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选集(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4.
- [8] 徐谦.关于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1927年3月10日)[A].尚明轩.宋庆龄年谱长编(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74.
- [9] 昨日女界同乐大会纪盛[N].汉口《民国日报》,1927-02-13(1).
- [10] 汉市党部妇女部昨日召集女党员大会[N].汉口《民国日报》,1927-02-20(2).

- [11] 汉妇协添办妇女平民夜校[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2-20 2(2).
- [12] 陈友仁致宋庆龄(1927年3月12日)[A].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
- [13] 致阿莉(1915年11月18日)[A]. 宋庆龄基金会. 中国福利会. 宋庆龄书信集(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2.
- [14] 社言. 女子法政讲习所开幕感言[J]. 兴华, 1923, 20(3): 4.
- [15] 复南京参政同盟会女同志函(1912年9月2日)[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第2卷)[C].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38.
- [16] 汉口孙夫人筹设女子政治学校[N]. 益世报, 1927-02-15.
- [17] 中国国民党妇女训练班成立经过[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3-27 3(1).
- [18] 妇女党务训练班章程[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1-11(5).
- [19] 妇女党务训练班今日开学[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2-12 3(1).
- [20] 昨日汉口十万妇女热烈纪念三八节[N]. 汉口《民国日报》, 1927-03-09 3(1).
- [21] 为创办湖北妇女党务训练班敬告全国女界同胞书(1927年1月20日)[A]. 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选集(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37.
- [22] 万女士与孙夫人之谈话[N]. 益世报, 1924-12-11(9).
- [23] 君平. 国民革命后幕中之孙中山夫人[J]. 上海: 妇女杂志, 1925, 11(8): 1351.
- [24]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2月)[A].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5]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1922年7月)[A].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66.
- [26] 论中国女权运动(1927年3月8日)[A]. 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选集(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27] 孙中山夫人在女子政治大学之演说[N]. 益世报, 1927-02-22(2).
- [28] 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2月12日)[A]. 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选集(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29] 妇女运动议决案(1923年7月)[A]. 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66.
- [30] 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的讲演(1924年11月28日)[A]. 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选集(上)[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Soong Ching-ling and Women's Movements during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YE Wei-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oong Ching-ling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feminist movement during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which she was an advocator, promoting women's suffrage and coordinating movements of women from both communist and democratic parties. After Sun Yat-sen's death, Soong stood into the politics on her ow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ocial skills and status to contribute to women's movement. Only with great women like her,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can break through the male-dominated state. Soong Ching-ling acted as a female leader to advocate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suffrage and channeled women's movements into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tic and cosmopolitan trend instead of some isolated movements for women's right.

Key words: Soong Ching-ling; feminist movement;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women's movement

(责任编辑 鲁玉玲)